

统中国的儒家伦理,也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,而是经过了文化自觉从而成为文化主体的“我们”与其他文化主体的“你们”在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价值体系。站在这样的起点上,我们才能从容检讨现代化理论的功过得失,将现代性中具有价值合理性的元素(如社会公正、人道主义、自由平等等)剥

离出来,使之与乡土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、人的内心和谐、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等价值观念相融合,形成新的价值体系,抚平因现代化的撕裂对社会造成的创伤,使现代化的城市化同时具有价值合理性和人性的基质。

短长书

花样的年华、草般的岁月

熊秉元

一九三六年的一天,在上海一家豪华酒楼里,有个奇特的聚会。十余位来宾,都是七十开外的耄耋长者。他们有几位穿西装,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长袍或马褂,还有好几位头上戴着传统的小圆帽。在外观上,他们举止从容优雅,看得出是受过良好教育,经过大风大浪,在华人社会里不折不扣的长者尊者。但是,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浓浓的中国气息;他们之间,彼此却以流利的英语交谈,而且是道地的新英格兰口音。更令人讶异的是,他们虽然已经年逾古稀,彼此却都还谑称:“囡仔(boy)”。

他们确实很特别,因为他们有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头衔——他们是

硕果仅存的“大清留美幼童”!

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之间,大清帝国前后选派了一百二十位幼童,送到美国留学;他们的年龄,在九至十五岁之间。按照计划,他们将住在美国家庭里,在美国读中学,进军事院校或大学理工科系,然后回国服务。虽然后来计划因故终止,但是在美国近十年的熏陶,已经让他们与众不同。他们之中最著名的,一位是铺设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,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。

无论在中外历史上,大清幼童的际遇,都是很奇特的一页。在这个过程中里,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。首先,容闳是一切的推手。他因缘际

会,由香港到美国求学,从常春藤名校耶鲁毕业。眼见西方文明之盛,再回头看大清社会的腐败落后。他觉得,惟有师法西方,而且从根救起,才可能振衰起弊。他所想到的,就是大量选派幼童,到美国受完整的教育,再回国一展所长。

容闳的抱负,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,当然不可能实现。晚清时期,曾国藩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然而,即使位极人臣,曾国藩还是要小心翼翼;环伺左右的,多的是怀旧排新、仇洋恨外的势力。稍一不慎,不但幼童留洋的计划功亏一篑,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
与容闳和曾国藩相比,吴子登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。然而,留美幼童整个计划的转折,却是由他而起。幼童到美国之后,集中在康涅狄格州(Connecticut)的首府哈特福(Hartford),为了就近照顾,也为了督导幼童,清廷在当地设了“留学事务局”,还派了督导人员。吴子登就是事务局的第四任主管;他到任之后,在星期六日按惯例召集幼童,教授四书五经。可是,他发现,在美国家庭待上一段时日之后,这些幼童们已经沾染当地自由开放的习气。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礼、背诵古籍、态度驯服谦抑;幼童们不服,更受不了

他的鞭笞和呵斥,于是冲突日益严重。

吴子登禀报清廷,长此以往,这些幼童将与西人无异,不再以圣人教化为依托。一连串的奏折,再加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风吹草动;清廷终于下令,终止留美计划,全体幼童分批返国。幼童们等于是犯错被遣返,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后,受到监视拘禁、类似犯人的待遇。

一八八四年,中法海战;法国军舰(铁壳船)和清廷的军舰(木壳船),在闽江口马尾附近接战。一阵炮声隆隆、硝烟滚滚之后,半个时辰不到,清廷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。被分派到福建水师的几位留美幼童,花样的年华就此画下急促的句点。一八九四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;在黄海海面,清廷的北洋海军受到重创,又有好几位留美幼童壮烈牺牲。

其他幼童的际遇,没有这么悲壮;不过,这些在美国土壤上迎接阳光、日益茁壮的精英,就在满清倾颓、民国肇始的动乱岁月里,像草芥一般随风飘舞、自求多福。

对于容闳、曾国藩、吴子登而言,他们的所作所为,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。容闳,基于自己的信念,推动幼童留美,数十年而不悔。曾国藩,考虑到朝廷情势、自己的政治处境,也只能顺势而为。吴子登,对美

国风土人情陌生隔阂,坚持“中学为主、西学为末”;他认为幼童应该尽速回国、避免持续受污染,也是出于一片善意。

当然,对于幼童留美政策中途而废,可以有诸多揣测。如果幼童的年龄再大一些,会不会好一些?如果就近照料监督的不是吴子登,政策是不是会持续?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,幼童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;学成之后,也持续地回国投入社会,清廷的命运乃至中国近代史,会不会就此改写?这些假设性的问题,令人好奇、引人遐思;不过,更根本、也更重要的问题是,由历史、旁观者的角度来看,大清幼童留美的做法,到底意味着什么?又透露出哪些问题?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,同样年龄的小朋友可能会出国旅游,到异地去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;但是,他们不会被移植到万里之外,在截然不同的土壤里成长,肩上也背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!

中国历史上,一旦社会面对重大变故,特别是瘟疫虫害水患等天灾;朝廷就昭告天下,皇上下诏罪己。然后,选个黄道吉日,皇上斋戒沐浴,登坛向上天祈福,并且恳切承诺,以后会更克己复礼、崇道修德。千百年来,同样的戏码一再上演。

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,带来

了蒸汽机火车轮船等等;西方列强的势力,活生生血淋淋地闯进自居为中土的古老帝国。一连串的挫败和羞辱,不仅有识之士、连老大的朝廷都意识到,下诏罪己、祷告祈福的举止,已经无济于事。继之而起的,是呼吁船坚炮利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、乃至全盘西化。留美幼童,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。

和斋戒沐浴、下诏罪己相比,选派幼童留美的做法当然要踏实得多。然而,考虑当时的主客观条件,这毕竟只是一种出于善意、想当然的企图而已。以一小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幼年,就希望能扭转一个庞大无比的老体系;不但清廷无从配合,一般社会更是鞭长莫及。毕竟,社会要能长治久安,不仅需要一套能正常运作的典章制度;还需要在面对考验时,有适当的机制,能因应、调整、自我更新。幼童留美计划的波折乃至于中辍,并不是偶然,而几乎是必然。

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写道:“新中国成立(一九四九年)之后,已具备数字管理的能力。”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大清留美幼童的史料,再想想中国历史上面对变局和考验时的做法,可能不会有如此天真、乐观、简单的判断吧!